

本期聚焦的三部作品,从不同视角切入三座城市的文化肌理。《茶馆: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(1950—2000)》生动复现20世纪下半叶与茶馆相伴的人和事,让市井烟火里的文化基因愈发清晰。《北京红色文化的文艺寻踪》则循着文艺名家的创作踪迹与珍贵手稿,在字里行间编织出一部新中国文艺建设的城市图志。《说扬州: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》在漕运帆影与市井喧嚣中,解锁扬州古城因商而兴的文化密码。这三部作品均以严谨的史料考据与独到的文化解读,引领读者在文字中探寻城市的精神脉络。

——编者

# 茶馆 藏着一座城市的烟火与人情

□叶祝弟

本书作者深入成都居民日常生活,不仅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方法,还广泛挖掘报纸、日记、私人记录等文献资料,搜集茶馆文化的口述历史,通过这些细节,重构普通人的公共生活,展现了茶馆业主、顾客、艺人、掏耳匠等群体的鲜活故事,以及他们在茶馆这一公共空间中的喜怒哀乐,绘就出一幅饱满立体的城市生活图景

他们的声音,这一切都是为了“得到被调查对象最真实的表达”,进而尽可能清晰地呈现真实的生活样态,“保存其中最自然的东西”。

王笛注意到,自晚清以来,逛茶馆和打麻将常

常成为被批判与改革的对象,其间遭遇种种外力冲击,从繁荣走向衰败,甚至一度绝迹。但改革开放后,即便经历了各种娱乐方式的激烈竞争,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逛茶馆和打麻将,“没有因为外来竞争而衰落”,反而越加欣欣向荣,发展到了新的高度”。那么,茶馆为何能“在风风雨雨中仍然保持生命力”?王笛的观察是:第一,茶馆既是成都独特地理环境的产物,更深深植根于成都作为“天府之国”的独特地域文化。在这种地域文化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大众文化,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性。戏园、讲评书、自发娱乐……“喝茶韵戏,以心寄戏”早已成为当地人既定的、熟稔的生活方式。茶馆文化是独特地域文化与人的心、人性的结合体,只要人心、人性未发生相应改变,即便因外界压力一时沉寂,一旦生存环境改善,这种生活方式便会迅速恢复活力。第二,市场经济激发了经营主体的活力。茶馆经营者能随时代变化不断调整经营方式:从最早使用留声机,到引进影像放映设施,再到设置私人包厢、提供麻将棋牌……他们在国家、市场与社会的夹缝中求生存,总能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。这种来自民间的自发力,值得深入研究。

第三,茶馆为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了可以呼吸的空间。一个正常的城市社会,需要多元化的城市空间来接纳各类群体的社会交往、娱乐乃至生存需求,满足人们“更多、更丰富的公共生活的选择”。在《茶馆》中,茶馆不仅为进城谋生者提供了就业机会,还满足了城市居民的多样需求:它可以是俱乐部,是茶艺展演赛场,是国际象棋赛场,是麻将室,是婚姻介绍所,是文人聚集地,是媒体记者的“第二新闻现场”,也是信息中心……由此可见,茶馆在城市公共生活中承担着五花八门的功能,这种丰富性显然是其他空间难以替代的。

城市文脉既是一种空间与自然形态,也是一种生活方式,更是一种人文精神。作为星罗棋布分布在成都街头小巷的茶馆,它首先是休闲、娱乐的空间。人们在这里喝茶、聊天、听戏、打麻将、交流信息,更承载着一种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与处世态度。保护城市文化遗产,实质是在保护一种生活方式。城市文脉根植于城市的历史,隐

藏在日常生活中,且始终对时代保持开放。当一种传统面对外来冲击时,唯有始终保持开放、对话的态度,才具有生命力。《茶馆》以丰富案例揭示:所谓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,而是“苟日新,日日新”的,是不断吸纳时代特质、持续被发明与建构的传统。那种对城市遗产“临终关怀”式的保护已毫无意义,城市文化遗产必须作为鲜活的力量融入城市生活;换句话说,只有在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中涤荡浸润,才能真正保护、激活并赓续城市传统。

一个有温度的城市,既要有烟火气,又要有人情味。烟火气体现在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里,人情味则体现在对外来者尤其是陌生人的接纳中,而这两者相辅相成。一个健康的城市社会,既要有私人空间,更要有像街角茶馆、菜市场、快餐店、口袋公园这样的“社会活动中心”。茶馆空间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容器,在当代文明转换的进程中,日常生活日渐成为城市精神、城市品格、城市软实力的源头活水。一个日常生活不够多元丰富的城市,不可能焕发真正的活力。因此,对城市文脉的保护,关键在于守护多样化的生活空间,城市更新理应为各种生活方式留下足够的余地。

此外,王笛的叙事手法同样值得关注。《茶馆》既可以看作严谨的历史文本,也可以视为生动的非虚构作品。作者总能将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,巧妙隐藏在冷静而生动的叙述中,这无疑得益于他兼具历史学家的严谨与文学创作者的笔墨功夫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写道:“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,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。”《茶馆》中巧妙运用了大量档案材料、新闻报道,尤其是中外作家的笔记与手札,这些素材丰富了关于成都的城市记忆。城市精神借由记忆得以澄清,而记忆并非虚空。它的印记留在城市的每一个空间,每一件物体上,构成了人与城市之间深刻而隐秘的联结。城市精神不会主动呈现,甚至会如手纹般隐匿自身,需要发现者通过探寻去体认、辨识和打捞。因此,寻找城市精神的过程,正是展现城市记忆的过程。

如今,全球化的冲击让城市逐渐变得千篇一律。但《茶馆》告诉我们,瞬息万变的时代背后,隐藏着变与不变的辩证法。在新的生活形态中,重新建立个人与他人、个人与都市生活的紧密联系,重新理解地方特质、构建面向未来的城市传统,在城市文脉中梳理过去与现在的关联、联通当下与未来,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。在这一点上,该书对茶馆的繁荣、消失、恢复乃至再度繁荣的细腻描摹,为我们赓续城市文脉提供了希望与可能。

(作者系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)

《茶馆: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(1950—2000)》(以下简称《茶馆》)是历史学家王笛写给成都的又一封“情书”。绵密而生动的文字里,不仅寄托着远方游子对故土的思念,更蕴含着对城市历史、现状与出路的深邃思考。

“观水有术,必观其澜。”《茶馆》所书写的,虽只是现代中国百年历史流变中的一片微澜,却能于波光中见大气象,于方壶中窥大天地。茶馆业的百年沉浮,不仅是成都茶馆的百年史,更是中国百年生活变迁的缩影。《茶馆》涉及的议题包罗万象,比如国家对日常生活的介入与调控、人文城市研究的地方路径、微观史如何通向宏观史等。在诸多话题中,对于今日中国而言,书中提出的“恢复和保存中国的城市遗产”这一命题,似乎更为重要而迫切。相较于文学家对“百年乡愁”的执着书写,近年来因大规模城市改造、大片老旧小区快速消逝而引发的“城愁”,却鲜有学者给予关注。

如今,没人会否认保护城市文化遗产(尤其是城市文脉)对彰显城市独特性、促进城市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。然而问题在于,相较于蔚为大观的国家历史叙述,城市历史叙述显得逊色不少,更不用说对城市文脉作细致梳理的著作了。此外,我们固然要呼吁回归城市传统,但值得追问的是:存在一种本性的、一成不变的城市传统吗?还有,对城市遗产的保护该选择何种路径?是做博物馆式的“临终关怀”,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彰显其真精神?

保护城市遗产,关键在于保护城市文脉。然而,“恢复与重建中国城市的历史”实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城市文脉往往并非清晰可见,很多时候甚至隐而不现。如何抵达历史现场、如何筛选材料、采取何种立场叙述,不同的方法和立场所呈现的历史往往大相径庭。一条可行的路径是,历史学家尽可能占有丰富材料,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,才可能接近历史现场。《茶馆》通过大量档案资料、新闻报道、文学作品,为我们具体而生动地呈现了以茶馆为代表的百年城市文脉的流变、曲折与发展。此外,作者借助田野调查,始终以平等的倾听者和对话者的身份,记录茶馆中形形色色的人,与他们随意交谈、倾听他

们的声音,这一切都是为了“得到被调查对象最真实的表达”,进而尽可能清晰地呈现真实的生活样态,“保存其中最自然的东西”。

王笛注意到,自晚清以来,逛茶馆和打麻将常

藏在日常生活中,且始终对时代保持开放。当一种传统面对外来冲击时,唯有始终保持开放、对话的态度,才具有生命力。《茶馆》以丰富案例揭示:所谓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,而是“苟日新,日日新”的,是不断吸纳时代特质、持续被发明与建构的传统。那种对城市遗产“临终关怀”式的保护已毫无意义,城市文化遗产必须作为鲜活的力量融入城市生活;换句话说,只有在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中涤荡浸润,才能真正保护、激活并赓续城市传统。

一个有温度的城市,既要有烟火气,又要有人情味。

烟火气体现在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里,人情味则体现在对外来者尤其是陌生人的接纳中,而这两者相辅相成。

一个健康的城市社会,既要有私人空间,更要有像街角茶馆、菜市场、快餐店、口袋公园这样的“社会活动中心”。

茶馆空间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容器,在当代文明转换的进程中,日常生活日渐成为城市精神、城市品格、城市软实力的源头活水。一个日常生活不够多元丰富的城市,不可能焕发真正的活力。因此,对城市文脉的保护,关键在于守护多样化的生活空间,城市更新理应为各种生活方式留下足够的余地。

此外,王笛的叙事手法同样值得关注。《茶馆》既可以

看作严谨的历史文本,也可以视为生动的非虚构作品。

作者总能将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,巧妙隐藏在冷

静而生动的叙述中,这无疑得益于他兼具历史学家的严

谨与文学创作者的笔墨功夫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

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写道:“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,只

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。”《茶馆》中巧妙运用了大

量档案材料、新闻报道,尤其是中外作家的笔记与手札,

这些素材丰富了关于成都的城市记忆。城市精神借由记

忆得以澄清,而记忆并非虚空。它的印记留在城市的每一

个空间,每一件物体上,构成了人与城市之间深刻而隐秘

的联结。城市精神不会主动呈现,甚至会如手纹般隐匿自

身,需要发现者通过探寻去体认、辨识和打捞。因此,寻

找城市精神的过程,正是展现城市记忆的过程。

如今,全球化的冲击让城市逐渐变得千篇一律。但《茶

馆》告诉我们,瞬息万变的时代背后,隐藏着变与不变的

辩证法。在新的生活形态中,重新建立个人与他人、个人与

都市生活的紧密联系,重新理解地方特质、构建面向未

来的城市传统,在城市文脉中梳理过去与现在的关联、

联通当下与未来,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。在这

一点上,该书对茶馆的繁荣、消失、恢复乃至再度繁荣的

细腻描摹,为我们赓续城市文脉提供了希望与可能。

(作者系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)

# “一方水土”是如何被想象的

□郭冰茹

城市与地方,是描述同一地理空间的不同视角。城市与乡村相对应,体现基于不同生产方式形成的生活逻辑、人际关系与价值取向;地方则与整体相关联,作为整体的一部分,其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呈现的“地方性”,突出的是这一地理空间的独特性。从根本上说,城市或地方,都是在具体参照系中对某一地理空间特征的指认;对城市的考察需置于围绕生产与消费的网络中,对地方的描述则明显带有地理边界的限定。由于关注点不同,两者虽能相互叠加却难以彼此化约,相关研究也往往独立展开。然而,《说扬州: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》(以下简称《说扬州》)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历史研究的单一视角,既描述扬州的城市历史,又聚焦其地理空间的内部肌理,在时间与空间的交汇、城市与地方的叠加中,呈现出扬州城的复杂面向。

对城市而言,商品与货币奠定了其核心本质,而围绕商品生产、流通与消费建立的管理机制和契约精神,决定了它的基本品相,并影响着城中人处理人与自然、与他人以及与自身的关系方式。可以说,正是商品交易和消费行为让形形色色的人聚集于城市空间,建立起与乡土社会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,重新定义了人际关系与交往模式。作为一部城市史,《说扬州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论述的。安东篱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:第一部分作为导言或概述,介绍此项研究的史学基础,以及扬州城的地理沿革;其余三部分则分别从贸易增长与城市地位确立、市政工程与城市管理、城市扩张与城乡关系变化,以及社会圈层与日常生活等方面,为这座在明清时期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城市画像。

大运河曾使扬州成为连接中国南北水运的重要税关口岸。尽管唐朝以后的人口迁移和明清时期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,让扬州在水运中的位置不再那般重要,但盐政和漕粮仍是其城市经济的基础,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。在《说扬州》中可见,商人势力崛起、财富聚集、流寓

人口增长、消费与文化休闲兴盛等城市化景观,为扬州带来了深刻变化。至今,我们仍能从“扬州园林”“扬州八怪”“扬州学派”等概念承载的城市想象中,感受到明清时期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喧闹——这些特点,显然是基于城市的商品性发展而来的。

从城市研究的角度考察扬州历史,的确能勾勒出这座城市从繁盛到衰败的轨迹。然而,一旦深入城市细部,单纯的城市视角便很难解释这一地理空间中出现的矛盾。比如:商人和士绅是扬州具有主导性的社会力量,可商人为何多为徽籍而非本地人?徽州女性与扬州女性的符号意义是如何建构的?当流寓人口与本地人口比例达到20:1时,这座“移民城市”是如何运转的,地方意识又怎样形成?显然,只有在城市研究中融入“地方性”视角,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合理阐释。

“地方性”视角本质上是一种比较或参照的视角。当《说扬州》将扬州与同为水运港口的汉口、镇江对照,将流寓人口与本地人的社会生活相对照,扬州城市的复杂性便清晰显现。扬州依托大运河与食盐专卖发展起来,是“一个人为的制度的受益者,其存在取决于国家政策”,因此它的盛衰自有其内在逻辑。扬州繁盛时期,长期居于此地的多为徽州人而非本地人。《说扬州》第四部分以《徽城,扬城》为名,既突出了徽商在扬州的重要性,也揭示了城市人口中“劳动的文化区分”:客居的徽商建园林、设雅集、结交文人、赈灾行善、参与地方管理,成为城市精英;本地人则靠地租或提供服务维生。而当米价暴涨、盐业凋敝,徽商便返回原籍,仅委派经纪人留扬经营纳税,本地人生活自然难以维继。至于饮食起居、婚丧祭祀等日常生活,流寓人口与本地人在相互模仿习俗的同时,也多少保留着“原籍”的某些传统。徽人与扬人构成一组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矛盾对立项,在互为镜像中揭开了城市的褶皱,照见了生活的复杂肌理,也塑造了扬州“一方水土”的独特性。

李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是安东篱研究扬州的重要参考文献。安东篱提到,李斗本可以按地方志体例,分沿革、地理、名胜、艺文、人物等部分撰写,却因感知到这座城市“有机性质”,最终写成了“一种充满戏剧性互动的城市社会叙事”。在《说扬州》中,官方文献里市民生、治水赈灾的记载,与诗词歌赋中声色犬马的“扬州梦”相互融合,叠加出地方志与城市史两个层面的扬州城。可以说,安东篱也以这种“戏剧性互动”的方式,串联起不同视角下的各类线索,回应了她在篇首提出的问题:“这座城市如何被想象?”

(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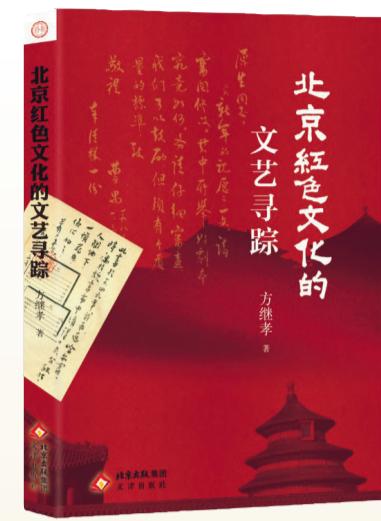


《说扬州: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》  
[澳]安东篱著  
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 
2022年5月

提及扬州,艺术家、文人、商人的群像,水道、桥梁、园林构成的秀丽风景,以及那些或浪漫或悲情的过往,便会浮现于脑海。学者安东篱在书中为扬州立传,通过还原明清时期的城肌理,让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在这幅生动的城市图景中清晰可见

李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是安东篱研究扬州的重要参考文献。安东篱提到,李斗本可以按地方志体例,分沿革、地理、名胜、艺文、人物等部分撰写,却因感知到这座城市“有机性质”,最终写成了“一种充满戏剧性互动的城市社会叙事”。在《说扬州》中,官方文献里市民生、治水赈灾的记载,与诗词歌赋中声色犬马的“扬州梦”相互融合,叠加出地方志与城市史两个层面的扬州城。可以说,安东篱也以这种“戏剧性互动”的方式,串联起不同视角下的各类线索,回应了她在篇首提出的问题:“这座城市如何被想象?”

(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)



《北京红色文化的文艺寻踪》  
著,文津出版社,2025年9月

□张艳梅

本书以第一手文献为基石,追寻20位文艺名家在北京的创作轨迹,于红墙灰瓦间凝练成新中国文艺建设者的集体肖像。书中近百张珍贵的名家手记、实物照片为首次集中影印展示,将人物生平与创作实践紧密交织,生动还原了新中国红色文艺在北京的发展历程

站在人类社会加速迭代的宏观视野中,书写城市文化链条的内在嵌合与再生动能,复活饱含情感深度的城市记忆,重塑城市与人的伦理关联,是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与文明新形态构建的重要路径。方继孝的《北京红色文化的文艺寻踪》,是作者在长期收藏相关史料、扎实考证红色文献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力作。书中记述了老舍、曹禺、赵树理、杨沫、管桦、萧军、浩然、刘绍棠、梅兰芳、焦菊隐等20位文学艺术家在北京或长或短的生活轨迹与创作历程。全书以第一手文献资料梳理绘制文艺图谱,穿插影印的156幅图片——包括手稿、往来书信、剧照、私人日记、书影等,纸墨质感与历史痕迹相互映照,清晰重现了抗战硝烟中的文艺阵地坚守、共和国建设中的文艺创作实践,以及艺术名家的精神追求和经典名作的诞生过程,既为读者提供了可进入真实历史现场的叙事文本,也是一份可供后续研究循证的“红色文献档案”。

走进城市微观历史的精神通道。对老北京而言,胡同里的烟火气、书卷气与艺术气息,蕴藏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一座城市往往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、生活节奏、审美风格与文化品格。在方继孝看来,值得关注的不仅是历史叙事的重新编码,更在于讲述者的观察视角与情感立场。作者站在历史链条的延长线上,对诸多历史细节展开深度挖掘,构建起立体多维的时空叙事空间。篇章未按人物生平简单线性编排,而是采用“空间—人—作品”三位一体结构,铺展具象空间中的人生与创作。开篇即呈现由北京胡同街路构成的地理方位图,围绕灯市口、中国文联芳草地宿舍、恭俭胡同、护国寺街等文化地标,逐一追踪20位文学艺术家大家在京的创作足迹。从“老舍:人民艺术家”启幕,到“曹禺:一生投身戏剧事业”,再至“梅兰芳:德艺双馨的京剧艺术家”,在城市地理与历史记忆的共振中,清晰勾勒出“北京红色文艺地图”。

该书以宏大历史进程为经、时代横截面为纬,以20位文艺家生平为点、老北京胡同街路为线、城市空间为面,通过史料呈现与历史解读的相互印证、人物评传与城市变迁的彼此呼应,拓展了红色文化研究的地理叙事路径。这种“历史文献+生活场景”的双重叙事,将红色文化转化为可触摸的城市记忆,以微观视角为红色文艺生产机制填充了饱满的历史现场与生活细节。书中通过文艺家在京生活轨迹及个人创作与文化政策的关联,展现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历程,揭示文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。

激活文化记忆中的红色密码。循着书中提到的老北京胡同与名人旧居,一步步走进光影交错的历史,既是对城市生命体的文化解码,也是心灵的叩问——这调动着我们的情感参与,唤起集体的精神记忆。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,诸多作家与艺术家的身心都经历了巨大考验。面对汹涌的历史浪潮,他们如何调整自我跟上时代方向,如何理解并书写崭新时代?方继孝努力褪去脸谱化呈现,还原艺术家的创作履历,在文化地图上标注出他们的鲜明位置,使散落的红色记忆成为连续流动的历史,不断延展为清晰的家国回响。

该书通过红色经典的再阅读,完成个体经验与时代洪流的双重书写。作者的叙述重心不在宏大事件,而是将红色文化的历史命题落到日常生活与作品生成中:老舍在《龙须沟》中倾注的现实关怀,与他车站送别友人时的情深义重;曹禺深入社会底层,为《日出》积累素材;管桦自小喜竹,亲手移栽青竹且常画竹赠友,还曾亲赴朝鲜前线创作《飞虎山》;梅兰芳与齐白石惺惺相惜,对国家和民族都怀有大爱……通过细读手稿与解析史料,